

l e t t e r s

128

法国大学 128 丛书

超现实主义

乔治·塞巴格 著

杨玉平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法国大学 128 丛书

超现实主义

乔治·塞巴格 著

杨玉平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现实主义 / (法) 塞巴格著; 杨玉平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9

(法国大学 128 丛书)

ISBN 978 - 7 - 201 - 05350 - 9

I. 超… II. ①塞…②杨… III. 超现实主义 IV. 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9539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字数: 97 千字

定 价: 12.80 元

引言

超现实主义既是一个文化运动，又是一种思想，一种梦幻。作为文化运动，它是诗人和艺术家大胆尝试的运动。作为哲学概念，它解析了理性的对立面。作为正在实践的梦幻，它歌咏了城市的魅力和精神错乱。它是一切高雅艺术的历史总结，把写作与潜意识，叛逆与爱情，日常琐屑与乌托邦融为一体。它似乎无所不包，令人称奇，吊人胃口，却又无法彻底解读。

历史学家惯于按照时间顺序罗列事实，量化结构，分析思维方式，这种方法很难对历史作出总结，特别是对超现实主义这样一个全面的历史现象就更难了。但历史学家，尤其是客观、中立、不带偏见的历史学家在研究超现实主义时，很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他似乎听到有人命令他：“进来！”或“别进来！”他会想起超现实主义者玩的虚构的小游戏，这个小游戏的内容是给某个冥冥之中的朋友打开大门，或将某个不速之客拒之门外。当然，比起神仙鬼怪来，历史学家更怕的是潮流之类的东西。但他们肯定知道他们掌握的材料绝不是惰性的。研究超现实主义的人，必须摒弃原有的冷漠，热情或偏

见,研究者只有在研究它的过程中才有权或喜或悲。

作为历史学家和批评家,本人试图阐述揭示超现实主义真实面目的方法和标准。我不想陷入历史琐事的泥潭,也不愿在文本堆里挣扎,而是希望尽量梳理出超现实主义的目的和观点,本质和象征。考虑到超现实主义是一个历史现象,我给自己的研究制定了两个指导框架,一个是超现实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另一个则是我们现在的角度。因此,1926年3月的一则广告把《超现实主义革命》描述成“世界上最惊世骇俗的杂志”,可我们按照今天的标准,便觉得这本杂志并无惊世骇俗之处,但它至少能帮助我们认识超现实主义者对“惊世骇俗”这个概念的理解。他们所谓的惊世骇俗,与达达派追求轰动,刻意挑衅的思想有所不同。人们总是从现在的角度出发去观察过去,从对二者的比较中更好地了解过去。而且,如果我们能勾勒出本世纪末感性与梦幻艺术的完整系统,我们就必然会在超现实主义那里发现它们的源头。

1924年的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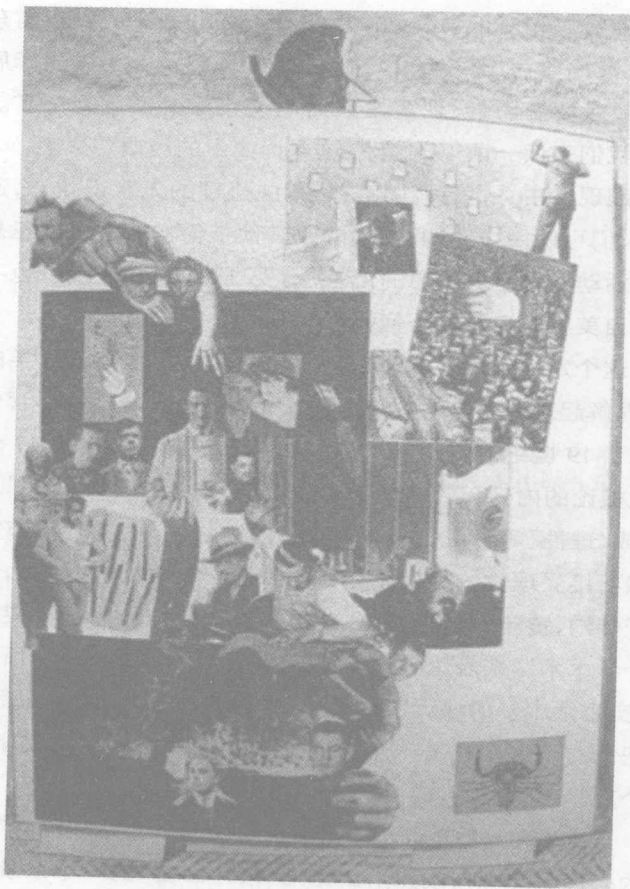
1924年10月,安德烈·布雷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第一次阐明了超现实主义的思想,列举了当时的超现实主义者 and 他们的先辈。他大胆地一锤定音,确定了“超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当他抛出这个词汇时,预感到它肯定会被社会接受,于是毫无顾忌地把它强加给法语词典或哲学词典。如果说,一方面他的大胆之举解决了刚刚爆发的有关“超现实主义”这个名词的来源和占有的争论,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诗人对于语

言的监督权和对于学院派的优先权。因此,安德烈·布雷东和保罗·艾吕雅为 1938 年 1、2 月间举行的超现实主义国际展制作的目录取名为《超现实主义简明词典》,就不足为奇了。还是让我们来读一读 1924 年在这本词典中的经典定义吧:

超现实主义,名词,阳性,是指纯心理的无意识状态,通过它,人们可以用口头的、书面的或其他任何方式来表达思想的真实活动。它是对思想的记录,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也不考虑来自美学和道德的任何约束。

这个定义中既包含了心理学的内容,又包含了哲学的内容,理解起来并不容易。“心理的无意识状态”一词,尽管分别继承了 19 世纪的唯科学主义,18 世纪的唯物主义和 17 世纪的机械论的内容,还是跳不出心理学的领域。至于“纯”,“思想”或“理性”等词汇,它们都属于哲学的范畴。然而,布雷东显然不受理性的约束或道德的禁忌,与理性主义相反,他求助于梦幻,童年,想象与疯狂一类的东西。但他为什么要使用一个学术术语来表达雨果笔下的“黑暗之口”或奈瓦尔所谓的“真实生活中梦的倾诉”呢?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不愿意人们把他的小组看成是一个新的文学或艺术社团,因此阐明了一个奠基性的理论,或者是一个新哲学的原则。

当皮埃尔·雅内把一种起决定作用的内心活动称为“无意识的心理状态”时,或弗洛伊德把“精神器官”的一个系统命名为“潜意识”时,他们是处在心理学和科学的背景下的。相反,“纯心理的无意识状态”完全是对一个原有事件的经验性的和主观性的再发现。大约在 1919 年 1 月的一个晚上,布雷东在入睡以前,似乎听到了“超现实主义的召唤”,他听到一句话不



马克斯·恩斯特,《朋友约会》,1931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断“敲打着窗子”。从此,他就能和菲利普·苏波等人,开始无意识写作了,于是就有了发生在1919年这个著名的夜晚之前和之后的历史。在此之前,心理的无意识状态是以相对的,不纯粹的,不完整的方式通过某些诗人或艺术家表现出来的:波德莱尔仅仅在道德方面是个超现实主义,马拉梅只有在袒露内心秘密时才表现出超现实主义的一面。1924年,布雷东已经能列举出一份实践绝对超现实主义的十九人名单了。单是“纯粹”一词就给在世的超现实主义者和他们的先辈划清了界限。

单从超现实主义的哲学定义来讲,布雷东指出,纯心理的无意识状态的目的是摧毁“其他的精神机械论”。人们由此推断,所谓的纯心理的无意识状态不是一种平常的机械论,它既不会沦落为一种纯粹的自然机械论或人工机械论,也不会变成生命的自我调控论,或是莱布尼茨的“精神自动装置”,更不会变成今天的思想机器。人们不能把它与某种机械模式,生物模式或自然模式混淆,而应当把它看成是一种不合常规的机械论,一种自发生长的东西,甚至是一种断断续续的流,一种挑战自然法则,社会常规和思想习惯的心理偶然论。

为什么《文学》杂志的主办者阿拉贡、布雷东和苏波逐渐赞成选择“超现实主义”一词呢?当然不是向吉约姆·阿波利奈尔的超现实主义戏剧《蒂蕾茜娅的乳房》(Les Mamelles de Tirésias)表示敬意。布雷东说,他们原本完全可以选择“超级自然主义”,奈瓦尔在《火的女儿》(Les Filles du feu)的题词中就欣然使用了“超级自然主义”。但与之近似的“超自然主义”明显的宗教或唯灵论内涵却让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由于希

望展示一种新的理论思想,他们最终敲定了“超现实主义”一词。然而这个词包含的哲学概念却有些含糊不清,因为,如果超现实主义希望表达“思想的真实活动”,那么,它就变成了认知领域的理想主义者,存在方面的现实主义者。这与象征主义诗人圣·波·卢的“理想现实主义意识”完全相符。《超现实主义宣言》的作者并没有忘记这一点,他在引述了这一思想。

两部传奇之作

超现实主义者都很快意识到创造历史的必要性,因此立即着手书写自己的历史。何况在他们看来,超现实主义的历史与现代化本身就是一回事。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已经开始利用当时的报刊或媒体指点江山,评论时事,甚至越俎代庖,去抢未来的历史学家的饭碗。他们发表的很多文章表现了他们融入历史的强烈意识:“我住在布朗谢广场有两个月了……”,“时间刚刚跨入 1922 年……”,“现在是 1925 年……”,“时值 1928 年……”,等等。或者像 1929 年 12 月 15 日《超现实主义革命》的最后一期把超现实主义置于一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用《走过千年的超现实主义》一文来纪念这个有趣的日子(查理三世死于 929 年,至此 1000 年)。

路易·阿拉贡的《当代文学史草纲》(Projet d'histoire littéraire contemporaine)(1913 年—1922 年的章节)和《1930 年文学导言》(Introduction à 1930)是纪录超现实主义运动史的开山之作。在他之后,安德烈·布雷东于 1934 年 6 月 1 日作了一场题为《什么是超现实主义》的讲座,并于 1952 年做了更为重要

的广播《访谈》。纪·曼热和莫里斯·纳多并不是超现实主义者,但他们于1934年和1945年分别推出了各自的《超现实主义史》。其中,布雷东的《访谈》和纳多的《超现实主义史》自发表之日起就成了有关超现实主义的权威之作,两部作品本身也变成了传奇,创造了超现实主义的伟大史诗。但它们同时也身不由己地格式化了超现实主义的形像。

莫里斯·纳多的作品并非无懈可击。一方面,他照搬了《什么是超现实主义?》的主要内容。1934年,布雷东从黑格尔学说的角度提出,“超现实主义已从它的英雄主义阶段”,“即1919年到1923年”,或从它的“纯直觉阶段”(1919—1925)发展到更具自觉意识的第二阶段,即少了几分理想主义,多了几分思考的“理性阶段”。而10年后的莫里斯·纳多对此是亦步亦趋,按照这些普遍接受的概念构建了自己作品的框架:“1923年—1925年的英雄主义阶段”,“1925年—1930年的理性阶段”,“1930年—1939年的自治阶段”。另一方面,这位40年代的历史学家还显示了一种较为激进的偏见,与皮埃尔·纳维尔当时维护超现实主义者的论点近似。总之,纳多认为,“如果说超现实主义身不由己地带来了绝妙的艺术爆炸,它同时也走进了理论的死胡同”。但今天,我们坚定地放弃了纳多的立场。我们寻求的不是未来的美妙乐章,而是利用超现实主义的自由精神来解读未知的乐谱。

在《访谈》中,布雷东特别谈到了在实践超现实主义的过程中,不断遇到的相识和相知。这些记忆既令人激动,又令人心碎。因此,布雷东能准确地描绘超现实主义的“重要过客”或“战友”的特征,例如保罗·瓦莱里、吉约姆·阿波利奈尔、雅

克·瓦谢、菲利普·苏波、路易·阿拉贡、皮埃尔·勒韦迪、特里斯丹·查拉、保罗·艾吕雅、马塞尔·杜尚、邦雅曼·佩雷、弗朗西斯·皮卡比亚、罗贝尔·德斯诺斯、勒内·克勒韦尔、马克斯·恩斯特、安托南·阿尔托、萨尔瓦多·达利、莱昂·托特斯基。以下是布雷东描绘的 1925 年的安托南·阿尔托：

也许他在生活中遇到的麻烦比我们每个人都多，他那时十分英俊，走路的样子让人想起黑色小说中描绘的那种雷鸣电闪的情景。他身上带着任何人都会有的愤怒，但这种愤怒有时也会化为一笑，青年人特有的一切挑衅情绪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安·布雷东，《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
Gallimard 出版社，《思想》丛书，1937 年，第 112 页

1952 年，当安德烈·布雷东回首超现实主义过去的几十年历程时，似乎感到欣慰：超现实主义并未在内耗中丧尽元气，也未被小小的困难吓倒，它成功渡过了浅滩。作为幸存下来的第一代超现实主义，布雷东守着一盏黯淡的灯，始终不渝地捧着“诗歌、爱情、自由”的座右铭，正坚定地等待着年轻的来者，和新的准备离开的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诗人在超现实主义漫长但尚未结束的实践中，始终无法向听众或读者揭示超现实主义神奇艺术的秘密。

超现实主义的接受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人们往往是用惊慌失措的

态度来面对来自超现实主义的杂志、小册子、书籍和展览。超现实主义离经叛道的思想甚至引起同情者的反感,一道鸿沟把代表高雅品味的人物和年轻的叛逆的超现实主义者分割开来,前者无处不在,在媒体上、展览会上或大学里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后者则坚决要动摇人类的理解力。说实话,阿拉贡、布雷东、苏波、德斯诺斯、佩雷、艾吕雅、曼·雷、莱里斯、恩斯特、马松、萨杜尔、马格利特、比尼埃尔这些人并不想吓唬无知的大众,他们也不奢求培养一群支持者或钓来一串订单。他们只希望遇到与他们气质相同的人,哪怕为此需要鼓动整个社会。他们吸引了,至少在一段时间中,吸引了像让·保罗·昂或乔治·巴塔耶那样谨慎的人。超现实主义激发了那么多热情,网罗到了那么多人才,并非出于偶然。

从1945年到超现实主义小组解散的1969年,尽管费迪南·阿尔基耶、乔治·巴塔耶、莫里斯·布朗绍或让·斯达罗宾斯基先后著书对超现实主义理论、心理结构和无意识写作等,作出了清晰的解释,超现实主义还是未引起重要的重新评价。此时,超现实主义的诽谤者已不断地宣布它的死亡,超现实主义的对头,伊西多尔·伊苏领导的字母派,尤其是纪·德博尔的国际境遇主义者联盟已自诩超越它了。自1970年以来,法国和美国的大学一直在研究超现实主义,但可与米歇尔·萨努耶的大部头《达达在巴黎》相比的著作尚未出现。《达达在巴黎》是一部内容庞杂,谬误甚多的论著,而1965年在巴黎大学却颇受好评。

25年来,人们对超现实主义众说纷纭,有人借助它来了解青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超现实主义杂志被重新印刷了,在

雷东和佩雷的全部作品被重新出版了。然而,人们对它的研究要么过于片面,要么过于盲目,使得人们无法涉及超现实主义的本质,更无法重新塑造超现实主义的形象。研究人员常常将自己封闭在一两位超现实主义者的诗歌作品或绘画作品中。人们对文学批评,或对艺术史、思想史,对先锋派的认识本来就很不全面,甚至充满分歧,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这一运动的现象性、意义性和它的想象空间。当然,也有人做了系统的研究和攻击,但那不过是让《TEL QUEL》的编辑们用来咒骂他们卓越的先辈,让心理学家们用来证实弗洛伊德模式的有效性,让女性主义者既可以用来大肆指责胆敢把妇女色情化、理想化、幼稚化的男性超现实主义者也用来清点那些保持完整个性的女性超现实主义者。总之,都是为那些赶时髦的潮流、理论、为那些文本主义者、那些阿尔图斯派、语言学家与符号学家服务,以此来证明他们自己的理论比被他们置于死地的超现实主义高出一筹。让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吧:自从布雷东去世后,尽管出现了几部上乘的研究之作,超现实主义还是未走出它的炼狱。

今天,尽管超现实主义已得到博物馆和大学的认可,但年轻的知识一代不再是它的迷恋者了,它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失去了“美妙的雪球效应”。早在1930年秋,超现实主义小组成员及《Le Grand Jeu》杂志的成员勒内·多马尔就曾给比他年长的安德烈·布雷东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为超现实主义中预言了一个悲惨的命运:

当心,安德烈·布雷东,我们日后会被载入文学史的

教科书,即使我们渴望某种荣誉,我们也很可能被后人列入灾难史。

自1945年,尤其是1970年后,人们把超现实主义作品归类,超现实主义逐渐被人们忘却了。然而,用另一番眼光来看待超现实主义文化主旨的时刻似乎来临了,因为我们感到脚下的政治土壤难以把握。当我们的精神被空虚占据的时候,我们能通过学习超现实主义受到启发,《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开篇写道:“除了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引发最广泛、最严重的意识危机外,超现实主义别无他求。”目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危机,我们当然没有引发这场危机,而且我们只是隐隐意识到了这场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向超现实主义者求援,就不是毫无意义的事了,他们既是制造危机的人,又是唤醒意识的人。

超现实主义的时代化问题:

永恒? 1924-1939? 1918-1968?

既然存在“永恒的哲学”,那么是否存在永恒的超现实主义? 如果人们相信1923年一幅名为《Erurarettil》的绘画作品对先行者的定义,那么超现实主义从来就不会缺乏先祖或先行者,这幅作品当时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它绘制了一幅由71位超现实主义先行者构成的星座图,这些先行者既包括了《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也没有漏掉雷蒙·鲁塞尔或皮埃尔·勒韦迪。无独有偶,1931年,一幅名为《看吧,别看》的画也提出了

五十六位超现实主义作家的大名,甚至上溯至赫拉克利特。如果说超现实主义喜欢沉溺于历史,其目的并不是将历史据为己有,而是为了纪念逝去的人和事——1929年是纪念发现歇斯底里症 50 周年,1959 年是纪念执行萨德侯爵遗嘱。超现实主义太迷恋现在和历史偶然,不可能想象把他们的名言和荒唐行为写入历史;超现实主义过于自负,也不可能哀求未来的人们给它留下一席之地。

像任何人一样,超现实主义有生也有死,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超现实主义存活了 15 年,即 1924—1939 年,从《第一宣言》的产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当然,这期间产生了一些重要作品,而且超现实主义运动还扩展到布鲁塞尔、贝尔格莱德、布拉格、伦敦和加纳利群岛或东京。其实,超现实主义这辆快车早在 1919 年 4 月就开始飞驰了,当时布雷东和苏波两人正在实验一种快速写作法,即《磁场》(Les Champs magnétiques)使用的无意识写作。这件事发生在查拉来巴黎之前,而且,只要布雷东活着,他就决不会认为有停止的必要。不管是把超现实主义这列火车开进火车站还是旷野,在他看来,存在主义、新小说、新浪潮、波普艺术和境遇主义都不会取代超现实主义。

某些历史学家把超现实主义的历史时段夹在达达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这就给了达达和存在主义更多的自由,他们似乎忘记了,从 1920 年 1 月到 1921 年 10 月在巴黎猖狂一时的达达主义者绝大多数都是尚未成熟的超现实主义者,更不要说特里斯丹·查拉本人也在 1930 年加入了超现实主义运动。至于存在主义,人们渐渐发现,它几乎变成了让·保罗·萨特个

人的哲学表现和新闻工具,而超现实主义甚至在 1945 年后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影响。

1919 年 3 月,《文学》杂志创立后,超现实主义小组开始寻求形成自己的小组。领导杂志的是阿拉贡-布雷东-苏波组成的三个火枪手,或称三元老。他们正准备实验无意识写作,但作为超现实主义的独特标志,无意识写作来源于安德烈·布雷东此前临睡时听到的一句话:“有一个人被窗户截成两段。”他是在 1918 年末还是 1919 年初听到这个无意识启示的并不重要。可以确定的是,这时一个意外事件扰乱了布雷东的内心世界。大概在 1 月 15 日,布雷东听到了他的朋友雅克·瓦谢在南特的死讯,他们曾经“决心要让世界处于半是不解,半是震惊的状态中,直到最后给它一个令人满意的表现,或者是惊世骇俗的表现”。这一点在瓦谢 1918 年 12 月 19 日给布雷东的信中提到了。他俩在 1918 年底就开始酝酿超现实主义的阴谋了。

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超现实主义涉及诗歌、艺术、个人道德和集体行为,它达到了浪漫主义或启蒙哲学曾经达到的高度,超越了同时代更狭隘的思潮:例如,未来主义、立体派、达达派或存在主义。如果要给超现实主义确定一个象征意义的时间界限,那么它开始于 1918 年 11 月 9 日,即《被谋杀的诗人》的作者去世的日子,或 11 月 11 日,即停战日。但这不是超现实主义真正开始的日子,瓦谢在他给布雷东的最后一封信中已经作了说明:“阿波利奈尔为我们做了很多,他真的没死,而且,他结束得正是时候——这句话别人已经说过,但我不妨再说一遍:他深深影响了一个时代。现在轮到我们

成就伟业了；现在是时候了！”1918年12月19日，瓦谢真正开始了，因为“现在是时候了”！

瓦谢致布雷东的最后一封信

1918年12月9日

我亲爱的安德烈：

我也想再见到您（聪明人真是太少了）我真羡慕您身处巴黎，可以骗骗那些值得骗的人！我现在在布鲁塞尔，凌晨三点，我又来到那熟悉的探戈氛围中。清晨，我的头脑特别灵活，对着一杯奇特的双管鸡尾酒和一个尖刻的微笑，我用一支彩色铅笔在罗缎纸上涂鸦，随意记录，我不知道自己记录了什么，知道吗，我不知道自己都做了些什么：您跟我谈起过一幕剧（那些字体—还记得吗—您细细谈过），您还跟我谈起给你的诗绘制木版画的事，这些事要推迟吗？对不起，您的上封信太晦涩，我没看懂，您要我做什么，我亲爱的朋友？幽默？我亲爱的安德烈，这可不是件小事，这不是什么新自然主义。什么时候您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再给我解释一下？我想我记得，对，咱们决心要让世界处于半是不解，半是震惊的状态中，直到最后给它一个令人满意的表现，或者是惊世骇俗的表现。当然不管怎样，我都委托您预备天主的意图，这将是令人失望的天主，爱嘲弄人，总让人生厌的天主。瞧，如果这个真正的新思维脱缰狂奔，那会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收到您那封贴满了剪裁画的信让我欣喜万分，信真漂